

常熟縣圖

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

江苏省常熟县 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常熟市档案馆 编
承 载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常熟市档案馆 编

承 载 译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常熟市档案馆
编译.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199-589-9

I. 江… II. ① 满… ② 承… ③ 常… III. 农村-社
会调查-调查报告-常熟县-1939 IV. D693. 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296 号

书 名: 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编 者: 常熟市档案馆 编译
承 载

责任编辑: 王志刚

封面设计: 宗 达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1—1 5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589-9

定 价: 20.00 元

本书系日本侵华机构“南
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撰写的调
查报告,此书的翻译为上海社
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文
献整理研究项目之一

翻 译 前 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实在不是一个体面的名称。这个集交通运输经营、自然资源开发、对华政策咨询、中国情报调查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日本机构,自 1906 年创办,到 1945 年因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彻底失败而终结,在华活动近 40 年,其包容对象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切入程度之深,恐怕是这一时期任何一个涉足中国土地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围绕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满铁下属的调查部以及分布在各地的事务所,以侵华日军势力为背景,对中国的东北(日方称“满洲”)、华北(日方称“北支”)、华东(日方称“中支”),华南(日方称“南支”)等地区进行的经济、社会 and 军事调查,更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政界、军界对中国的认识,并作为其政策意向而应用于战时决策。

多年来,满铁调查资料成为学术界经常引用的对象,不过,对于满铁在华调查工作的专门研究,则是近年来才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这类研究,一般均从宏观方面着手,或疏理资料种类,或论述调查工作的观点,但对于调查资料本身的具体研究,尚未形成。选择有代表性的资料译出,不仅可供学术界研究,还可以让今人看到这一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翔实可信的资料,在当年的中日政治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通常,民众所了解的当年的日本军方势力控制中国社会的手

段,只是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其实并不尽然!在日本军国主义深谋远虑的对华政策中,利用各种机会,动用各种手段来开展社会调查,从而获取有利于其控制中国社会的资料,正是其伴随着武力而同时并举的一把“软刀子”,更是其实现长期占领的战略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满铁成立于1906年11月,1907年4月正式运营,与此同时,陆续设立各种长期或临时性调查机构,开始对中国的东北及其他地区的展开调查。明治40年(1907年)设满铁调查部(后改称调查课),明治41年(1908年),满铁东京支社设东亚经济调查局,大正12年(1923年)设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昭和7年(1932年)将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改组成经济调查会,昭和10年(1935年)在哈尔滨铁路局设哈尔滨经济调查所(后改称北满经济调查所)。满铁设立的其他事务所,如满铁长春事务所、天津事务所、上海事务所等,都设调查课,从事规模不等的各种调查。陆续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如满铁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满铁国际收支调查委员会、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等的调查项目,更从专业角度搜集情报。满铁的各职能机构,如满铁社长室、总裁室、总务部、弘报课、资料课、交涉部资料课、矿业部矿物课、兴业部商工科及农务课、产业部、地方部等,都曾主持过与其职能有关的调查,并编印过调查资料。随着满铁实力的不断扩张,它除了在中国进行调查之外,还设立了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机构,如东亚经济调查局,原属满铁东京支社,着眼于东亚和世界经济动向的调查研究,昭和4年(1929年),该局成为具有财团法人资质的国家性调查机构。

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满铁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势力联系日益密切,其调查工作的执行可分两大系统,一是由满铁临时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主持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该会是满铁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月应关东军要求而设,于

1936年10月废止。其调查对象主要是关东军势力范围内的东北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经调会的调查资料的内容主要为东北三省及邻近省区的道路、水运、森林采伐、家畜饲料、燃料、牛、毛皮、大豆、高粱、课税、外商势力等，基本上是以一个专题作为一编，单独成书。经调会作为“伪满洲国”的政策咨询及策划机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制定战时经济政策提供了帮助。

另一是以满铁天津事务所调查课为主的冀东农村调查，以及以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课为主的江南地区的农村实态和工业实态调查。冀东地区是指长城线以南，和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内含22县，人口600万，面积约8000余平方公里，略大于日本九州。冀东的调查工作时间与东北的农村调查几乎同时，于1936年4至5月间实施，共调查了16个县的25个村。后者的调查工作在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陆续展开，以上海市周边150公里内的苏南地区为主，如松江、嘉定、太仓、常熟、南通、无锡等县。

研究表明，经调会设立以后，即有“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并始终处于日本侵华军事主力的控制之下。其主要活动称为“立案调查”，即配合侵华政策的制订而展开调查。所谓政策，其中既有伪满傀儡政权的基本政策，即经济统制政策，也包括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的拟定。以此为前提而展开的调查，除围绕制定政策的调查外，还有具战略特性的单独立项的所谓“特殊调查”。在经调会存在的近5年时间内（1932年1月—1936年10月），前期以服务于制定政策为主，后期则侧重战略性的特殊调查。特殊调查主要针对以“国防资源”为前提的资源、兵事、经济方面的中观、微观调查，其调查工作大都为军部、满铁合为一体，共同进行。如此的密切合作，在关东军方面来看，目的是把在关东军势力控制下的“满蒙”，尽快融入日本实行“总力战”的框架之中，即从经济、军事方面把东北推上

军国主义道路；而对满铁来说，虽然这是经调会从伪满洲国基本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转向“满洲经济的根本研究”，但实质上却是配合军方构筑“总力战”框架的基础性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满铁天津事务所开展了冀东农村实态调查。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经调会驻天津“干事附”伊藤武雄。关于调查的起因，据伊藤武雄晚年在其所著的《生活在满铁》一书中说，是源于他在闲暇时制定的“冀东十三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谁知这项计划“意外地”得到了军方认可，于是便获得了实施的机会。言外之意，这项大规模的调查工作的实施，只是一种机缘上的巧合。但是，据井村哲郎所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一书的记载，由于伊藤武雄的这一说法草率得几乎无法使人相信，他因此遭到质疑，于是，伊藤武雄又改称这次“有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以天津军即中国驻屯军名义进行的”。以军方名义展开的农村实态调查，至少有一点无法回避，这就是：调查与驻天津乃至企图占领全中国的日本军队制定和实施其在华北的政策需要有关。作为同类参照的实例，就是人所共知的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后所进行的“台湾旧惯调查”、以武力入侵东北时所进行的“满洲旧惯调查”。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展开之时，日本军方正在精心策划“华北自治”，试图以此控制华北，进而建立殖民统治，而一个与调查工作形成前后呼应的事件就是，当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刚刚结束，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就于 1936 年 8 月 15 日推出了《农村组织化大纲》。《大纲》强调了要把对华工作重点放在把握民众的方面，其对策就是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其具体方法就是把农民置于“系统的组织的合作社”之中。《大纲》决定，在冀东 22 县设立村合作社、县联合会和合作社总局，“农家全部强制加入”合作社；为使合作社有效的控制在日本军方手中，总局内将配置“相当程度的日本人”。以军方名义对华北农村展开的首次调查，是在冀东进行的；而作为控制华北广

大农村地区的关键性举措,也首先在这里实施。可见,两者之间其实有着非常明确的依存关系。

在冀东农村开展农村实态调查,着眼点相当微观,目的却有宏观意义;在调查基础上实施农村社会组织化,也并非仅仅为了控制冀东或华北。以此为发端,随着八一三事变的发生和南京的沦陷,满铁在军方势力庇护下的调查工作重心南移,由华北转向华东^①的苏南。

七七事变前已升任满铁天津事务所“主事(所长)”的伊藤武雄,事变后转任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事”,继续开展以农村实态为主的社会调查。自此,拥有 300 名各类工作人员的上海事务所,不但成为满铁在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活动中枢机构,而且在日本的对华情报特务机关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满铁上海事务所在伊藤武雄主持下开展的苏南农村调查,起到了帮助占领政策作出战略调整的导向作用。伊藤武雄于 1920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满铁工作,曾与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刘少奇等有较多接触,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有比较具体、深刻的认识。满铁对华调查工作重心的南移,一方面是由于日军的大规模南侵,另一方面,则与伊藤武雄为呼应日军全面侵华而提出的“三角地带论”不无关系。

所谓三角地区,即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它包括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型工商业城市,以及水网密布、盛产稻米、棉麦、蚕桑的杭嘉湖农村地区。这一区域,自明清以来一直在中国经济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伊藤武雄认为,战争的爆发,使这一地区的农工商各业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萧条与衰退,这

① 华东,原文或作“华中”,或作“中支”,均指中国东部的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等省一带,现统一译为华东。译者注。

固然直接影响民众生活,但更将影响日本势力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稳定的存在。如果连一向富庶、安定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都因战争而丧失其经济上的领先地位,那么,要想长期占领中国无疑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尽快恢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繁荣,就可以吸引和掌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占领区内的民心;一旦这一地区获得繁荣,那么,日军在华东也将不战而胜。

伊藤武雄的这一主张,对于日军占领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后的政策调整与实施,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军事进攻行动结束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稳定占领地区。对此,日军也采取与华北相类似的手段,通过向占领地区派遣由军方和其他人员组成的“宣抚班”,直接插手当地的军政事务,以此加强社会控制。不过,日军控制华北的手段是以军事化“统制”为主,这一方式是否适合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军方并没有完全的把握。

从1937年12月起,日军在南京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派遣了华中宣抚班。在华中宣抚班,来自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有近80人,约占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伊藤武雄曾说,向这一地区派遣宣抚班,是他说服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少将后的结果,而将满铁人员编进宣抚班,更是一个“高明的办法”。事实表明,上海周边各县,诸如太仓、丹阳、嘉定、芜湖、嘉善、松江、镇江等地宣抚班,以及南京、杭州两地的特务机关人员,均为隶属于满铁机构的人员,而各地负责宣抚班工作的为首者,则几乎全部来自满铁上海事务所。日军向占领地区派遣宣抚班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长久的政治统治。在《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的“县情概况”中就明确提到: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攻陷常熟县城以后,即组织自治委员会,延续到翌年6月底止。从1938年7月1日起,在日军宣抚班的指导下设立县公署,从而“跨出了从破坏到建设的强有力的一步”。这也就意味着,宣抚班的主要工作,是在符合占领军利益的基础上,重建地

方管理机构,将社会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占领者手中。

向占领地区派遣宣抚班,并以“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为出发点开展各类调查,还与日本军方将“三角地带论”直接运用于掌控这一地区经济主导权的意图有关。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一直是抗日力量和日伪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区,新四军抗日游击活动在这一带的活动也甚为活跃。到1938年年底,新四军已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新四军东进,先后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西部)抗日根据地。而这一时期,华中宣抚班在江南各占领区内频频插手地方管理事务,在伊藤武雄主持下的满铁上海事务所,则开始从事各种有目的、有规模、成系统,其成果可以相互印证、以点带面、直窥全局的调查工作,甚至派出了参事级的调查员参与工作,并将宣抚工作报告当做正式的调查资料处理,足见其对社会调查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之重视。

满铁上海事务所在苏南地区实施的农村实态调查,于1939年至1940年先后展开,调查地点分别为上海特别市的嘉定区,江苏省的松江、常熟、太仓、无锡、南通等地,所涉及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县情概况调查,再是对某个村庄详细情况的逐项调查。无论县情概况还是村庄详情,调查内容绝大部分都与地方行政、财政现状、生产方式、农副业经济、土地占有、家庭结构、生活消费、经济收支状况有关。每种调查成果,除了将调查内容付诸文字表述之外,均附有被调查村庄翔尽的分户统计表格。在嘉定、常熟、太仓的村落调查中,重点是当地主要物产——稻米的种植、加工和销售,其目的明显具有怎样在战时状态下为城市社会、特别是上海这个大都市提供足够的粮食的倾向。对常熟县,又将调查农村社会在战争中的受害状况作为“主要目的之一”。1940年以后在松江、无锡、南通开展的

调查,重点各有区别。据伊藤武雄在为《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所写的“序”中说,“众所周知,松江是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的粳米产地,无锡以养蚕业为大宗,南通则体现了以棉布为主的手工业的特征”;对无锡荣巷镇的村落调查,除了弄清当地蚕桑业的实态外,“重点是探究都市与农村的关系”。太仓、常熟、松江等地的稻米,南通、无锡的棉布蚕桑,是日本军方严格控制的战时紧缺物资,对其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不仅有必要弄清实情,而且要尽可能使其生产规模回复甚至超过战前的水平。都市与农村的关系,则以着眼于江南地区城市与农村的分布格局、人口流动、土地使用状况等。

尽管方法上完全合乎社会调查的规范,但是对现象作出的判断却无法摆脱其配合日军实施占领政策的倾向。常熟县的农村调查,有相当篇幅集中体现了“事变”前后的状况对比。对于该县田赋收入的减少,一方面认为与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有关,另一方面,则反复强调依靠武力肃清治安的必要性,甚至提出,要“以征收田赋为前提”,让“皇军警备队”“恳请在县内实行扫荡,以期保证地方征收顺利进行”。该调查中还反复重申恢复和提高农业、蚕桑业、畜业生产的必要,包括恢复农业金融、重建农村合作社等有助于农民发展生产的措施在内。但其出发点,则是试图通过这些措施,在上海周边建立相对稳定的物资供应基地。例如,在调查了常熟的畜业状况后指出:

养猪业一向以长江对岸、即苏北一带为盛,相对本县而言,占有压倒性优势。本县所需猪肉,由于一向依靠苏北,因而并无从养猪业中获得利益之经验。故此,其品质之改良,产量之增进,均不予重视。但事变之后,主要都市之肉食品需求顿增,猪之配给地亦不可独赖苏北,以本县土壤之肥沃,且临近上海,又为盛产稻谷之地,故敦促农家发展养猪业,实为重要紧急之问题。(《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第一编·第六章·第五节”)

更能直接表现日本军方急于控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主导权

的侵略心态的,是对无锡的工业实态调查。当时,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在无锡周边农村较为活跃,给试图建立占领区“新秩序”的日军以很大打击。同时,无锡的城市工业虽受到战争破坏而有所萎缩,但尚未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只要管理得当,仍有恢复的可能。最令日本军方头疼的是,新四军着眼于“把握民心”,“活动相当的组织化、合理化”。为此,由侵华日军驻苏州的广野部队提出调查计划,伊藤武雄主持下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于1939年6月至8月,投入了大量人力进行实施。这项调查是目的,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的“前言”中说得很明白,“靠武力维持治安的时期业已成为过去”,“向新秩序出发的可能阶段业已来临”,“我们不是不清楚采取何种对策的方向,而是由于还不了解重要的实情,因此难以作出具体处理”。这就是说,政策导向其实已经具备,而制定政策的依据却并不充分可靠,所以一时不敢贸然着手。那么,依靠什么方法来“了解重要的实情”呢?在军方的保护之下,派遣大量有经验的调查员开展实态调查,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江南六县的农村实态调查作为“华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资料”而得到重视,无锡工业实态调查则由于资料翔实,成果丰富,被满铁调查部称为是“解决新中国建设和新秩序确立问题的一把钥匙”。报告书中还提出,如果一味进行军事化的“统制”,不仅市场无法恢复,“一般民众的不平不满也会更大,结果给附近的游击队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客观态势”。看来,这就是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及其领导下的上海事务所进行江南农业和工业实态调查的真实意图。

满铁的两大调查系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带着不同目的,对中国东北、华北、江南进行了比较深入具体的调查。其形成的调查报告,资料固然翔实可信,但在当时,这些资料的首要用途,并非为了学术,而是为日军在华势力的长期存在而打造基础;或者说,是为

其制定政策提供有足够影响的参考。从学术角度上来看,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作翔尽考察,要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深入研究,那么,产生于这一时段的满铁对华调查工作及其大量成果,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的。当我们在阅读、利用这批反映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状的珍贵资料的同时,却无法排除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证据的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这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也并非出于被侵略(用今天日本某些人的话说是“进入”)一方的受害心态,而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审视以后得出的必然结果。

史学家王家范教授对于 20 世纪前半的日本在东亚各国或地区的种种行为,有如下说:

日本有理由为其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残酷的代价。(《程兆奇著〈南京大屠杀研究〉序》,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

这样的话,一般也许以为就是大而化之的泛泛之言罢了。其实不然!当你一涉及具体对象,再细细体味,便不难悟出其道理所在。所谓“骄傲”,所谓“残酷的代价”,不特中肯,且大有值得深究之处。平心而论,满铁在中国东北、华北、江南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其工作方法,其调查成果,均不可否认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合理性。然而,可为深叹的是,如此令人“骄傲”的成果,却与人类文明史上极其惨烈的一幕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同样的,曾经全身心投入这些调查的主持者、参与者,其中不乏学有所成甚至颇具见识的学者,但是,他们身处其时其地,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侵华势力的工具。这样的“代价”,对于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分子来说,难道还不够“残酷”吗?

本书原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编辑出版的“上海

满铁调查资料第三十四编”，于1940年在上海印行，时属“非卖品”，流传甚少，今已鲜见。此次翻译，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的文献整理项目之一，由常熟市档案馆作为抗战时期常熟地方史料予以出版，便于今人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时期的常熟农村社会情况。翻译过程中，原书的地图、照片、文字、表格等均不作删改，原文中带有蔑称性质的语词，加双引号标出，或作必要的译注；个别明显的文字、数据讹误，原文用圆括号标出，后加方括号予以订正。至于原编者出于其当时目的而在内容中的不当表述，相信读者自有辨别能力，翻译时不再一一注明。翻译工作还得到了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陈达明先生的大力帮助，谨此深表谢忱！

序

本稿为昭和十四年(1939年)6月中旬至7月中下旬,以本调查室第五股为主、相关各股协同参与的农村实态调查(嘉定、松江、常熟三县所属^①)常熟班的调查报告书。事变爆发两年来^②,尽管我们的前线已远远越过了武汉,但遗憾的是,本调查队所进入的上海周边郊县,其治安状况却未见改善,加之正逢当地农忙,给调查员的活动带来了很大妨碍,故未能进行充分的调查。不过,就在治安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却未伤亡一人,吾国同胞勇敢地在中国首次执行了农村实态调查,其成果得以于兹发表,真乃吾人深感欢欣之事。最后,谨向为本调查班成员担当警卫工作的各该县守备队官兵、在调查中提供种种方便的特务班各员、在调查中给予合作的县公署县长及各

① 此次调查后,由各调查队分别撰有《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及本报告书等3份资料。次年,满铁上海事务所又组织实施了对江苏省无锡县荣巷、江苏省太仓县遥泾村,以及江苏南通县头总庙村的农村实态调查,并分别撰有报告书。此6份调查报告书,今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译者注。

② 指1937年七七事变及日军全面侵华。译者注。

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相关官员,以及调查村庄那些曾给予种种关照的户主诸贤,表示不成敬意的感谢。

昭和 14 年 11 月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主事

伊藤武雄^①

① 伊藤武雄(1895~1984),日本爱知县人。1920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满铁工作。1930 年起历任交涉部庶务课长、总务部调查课长、经调会干事、天津事务所主事、上海事务所主事、总裁室参与。多次兼任军“嘱托”顾问等职。1936 年,制订冀东地区 13 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获日本军方赞同,随即具体主持了部分调查工作。七七事变后,满铁调查工作中中心南移,伊藤武雄提出在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区域进行农业、工业,并兼及社会、民俗状况的调查计划,以积累一批“华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资料”。战后,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曾任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会长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著有《生活在满铁》一书,于 1982 年出版。书中对满铁大量搜集中国东北、华北、江南等地经济、社会情报的意图有所粉饰。译者注。